

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方山县酿酒史溯源及流变研究

□ 闫卫星

方山县,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县域。其酿酒历史源远流长,不仅见证了中国酿酒技术的演变,也反映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本文将对方山县的酿酒史进行溯源及流变研究,探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酿酒技术和产业发展,并结合现有的山西于成龙酒业、良泉酒业、老传统酒业等企业,分析其在现代酿酒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北宋时期的酒税务印



方山县酒税务铜印

方山县,是一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表明,在那时,方山县境内便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战国时期,方山县境内始置泉泉邑,属赵地。隋大业三年(607年),置方山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尽管方山县的酿酒历史在早期记录中并未明确提及,但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位于方山县附近同属吕梁市的汾阳杏花村的考古发掘点显示,中国在6000年前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杏花村的考古发现包括陶器碎片和青铜容器中的酒渍残留物,表明当时的酿酒原料包括稻米、蜂蜜、水果等。虽然这些发现主要集中在杏花村,但类似的酿酒技术可能在相近的地区如方山县也有所传播。特别是明清时期,方山区域由汾州府管辖,这就更进一步加快了酿酒技术的传播。

《文物》创刊于1950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主管、文物出版社主办的考古类学术期刊,在考古界有非常权威的地位。该刊1980年某期中刊载了一则报道,消息称,1980年7月,江苏常州市电讯器材厂在建造住房时,出土了一方铜铸官印。这方铜印通高3.8厘米,略呈长方形,长5.3厘米、宽5厘米、厚1.2厘米。板面呈角,素面穿孔,高2.6厘米、厚1.3厘米。印面阳文篆书“方山县酒税务朱记”,印背阴文篆书“崇宁三年四月少府监铸”。这一发现表明,北宋时期的方山县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酒税管理制度。

这方铜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北宋时期酒税管理的实物证据,也显示了方山县在北宋时期的酿酒业已非常繁荣。这方印的发现为考证当时经济活动和社会税管理提供了实物资料。北宋时期,酒税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方山县酒税务印的发现,说明当时的酒税管理已经相当规范和系统化。铜印上的文字“方山县酒税务朱记”表明,方山县的酒税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标识和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规范酒的生产与销售,也有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此外,铜印的发现还揭示了北宋时期地方行政管理的细致和严谨。印背的铭文“崇宁三年四月少府监铸”表明,这方铜印是由少府监铸造的。少府监是北宋时期负责铸造货币和官印的机构,其铸造的官印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方山县的酿酒业在北宋时期已经非常发达,这不仅得益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行政管理。

方山县酿酒业的传承

1. 酿酒业的历史沿革

方山县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那时的酿酒业已经初具规模,酒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元明时期,酿酒技艺进一步发展,方山县的酒开始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流传。到了清代,方山县的酿酒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酒的品种和产量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方山县的酿酒历史不仅在古代有着辉煌的篇章,在近现代历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方山县志记载,大武镇的“景荣源酿酒坊”,酿酒历史可追溯到唐朝贞观年间,距今已逾千年。1945年,贺龙元帅所部接管“景荣源酿酒坊”,所酿之酒用于晋绥军区司令部招待党中央领导和功勋战将以及社会名士,极其珍贵。1949年2月,更名为大武酒厂。建国前,方山县大武酒厂及于成龙酒厂前身的于氏家族老酒坊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生产的酒精不仅支援了红色钢铁走廊上的战士,更为方山县南村的国际和平医院分院提供了医用酒精,这种贡献,成为方山县酿酒业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酿酒人。

2.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方山县位于黄河中游,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里的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非常适合酿酒原料的生长。方山县的土壤肥沃,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酿酒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方山县的水质纯净,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这里的地下水经过地下岩层的层层过滤,水质清澈甘冽,是酿造优质白酒的理想水源。方山县的水质,不仅提升了酒的品质,更增添了酒的自然风味。

现代酿酒产业的发展

1. 于成龙酒业的现代发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山西于成龙酒业,于成龙酒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576年,当时于成龙的祖父于采在永宁州于家庄创建于家酒坊,开启了于成龙酒的历史篇章。于成龙酒业的酿造技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改良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六古”工艺。这种工艺不仅在原料选择上严格把关,更在酿酒技术上精益求精,最终形成了于成龙酒独有的“窑香”特色。

“六古”工艺的核心在于对传统酿酒技艺的尊重和传承,同时结合现代科技,不断创新和提升,确保了酒的高品质和独特风味。北武当山下的神泉圣水,为于成龙酒的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泉水清澈甘冽,富含多种有益微量元素,使得于成龙酒在品质和风味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于成龙酒业在现代的发展中,不仅注重传统的传承,更积极融入现代科技。企业通过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研究单位的合作,组建了行业唯一的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科技创新平台,从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信息科学等多个高新技术领域对白酒生产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入研究。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酿酒技艺,更让于成龙酒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于成龙酒业还积极探索品牌文化创新表达,从首创国窖1573封藏大典到举办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一系列有影响

酒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方山县的水质纯净,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这里的地下水经过地下岩层的层层过滤,水质清澈甘冽,是酿造优质白酒的理想水源。方山县的水质,不仅提升了酒的品质,更增添了酒的自然风味。

3. 酿酒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方山县的酿酒技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从早期的简单发酵技术,到现代的全产业链模式,酿酒技术的进步不仅提升了酒的品质,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现代酿酒技术注重原料的选择和工艺的精细,确保了酒的风味和品质。方山县的酿酒企业,如山西于成龙酒业、良泉酒业、老传统酒业等,通过科学种植和管理,确保了原料的品质,提升了酒的品质。



方山县大武酒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部分产品

力的活动已成为于成龙酒业独有的IP。通过艺术的力量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于成龙酒业不仅在传承中创新,更在创新中传承。

于成龙酒业秉承“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天理良心、清正清廉”的古训,崇尚“传承古法,匠心酿造,丰富酒文化,助力家乡建设”的经营理念,致力于将企业打造成国内顶级名酒产地。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文化推广,于成龙酒业决心让于成龙精神永流传,让非遗窑香酒香飘世界。

2. 良泉酒业和老传统酒业的贡献

良泉酒业依托方山县丰富的水资源和优质的原料,生产出口感纯正、香气浓郁的白酒。企业注重原料的选择和工艺的创新,确保每一瓶酒都达到高标准。良泉酒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致力于提升品牌形象和社会责任。

老传统酒业“坚守老传统,只酿纯粮酒”的理念,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同时,不断探索和创新,力求在现代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老传统酒业的产品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文化内涵,深受消费者喜爱。

方山县的酿酒史不仅是一段技术发展史,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史。通过科学种植和管理,确保了原料的品质,提升了酒的品质。通过文化活动的举办,推广了酿酒文化,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方山县的酿酒史,是一段值得深入研究和传承的历史。

汾阳地处晋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二千六百年,设郡、州、府、县、市建制长达一千五百余年。汾阳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远在六千年前,即有原始先民在此定居,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

1998年,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汾阳,对汾阳杏花村遗址进行细致的野外调查,用一件件深埋在地下的古代文物器物撩开汾酒历史神秘的面纱。

杏花村遗址在如今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其内涵的分析,考古学家将遗址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

其中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有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碗、刀等生活用具,此外还意外地发现了稀世珍宝小口尖底瓮,成为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酿酒容器。原始先民把谷物装进小口尖底瓮中,待其发酵成酒后即可澄清饮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即从这种瓮象形演化而来。

杏花村遗址小口尖底瓮的出土,把我国人工谷物酒的酿造时间提前到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个发现,为探讨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标本,也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一把新的钥匙。

在杏花村遗址第三、四、五、六阶段,考古学家们挖掘出相当数量的壶、尊、杯、甗、大口瓮和三足杯等陶制酒具,这一时期,也是华夏造酒之祖伏羲和杜康生活的时期。

在杏花村遗址第七、八阶段,主要为商代器物,其中的酿酒器、盛酒器品种数量均显著增多,尤其是遗址中发现的玄纹铜爵,是商代青铜酒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遗址中出现这样精美的酒具,当时所酿酒的质量之好可见一斑。

得天独厚的杏花村,用水和高粱酿出属于自己的荣誉与财富。这里有着让人羡慕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平整,出产的高粱颗粒饱满,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酿造使用。这里还流淌出源源不断的地下泉水,清澈透明,味美甘甜,杏花村的空气和土壤,也含有多种有利于酿酒的微生物。这些都构成了非他处可比的产酒优势。

多少年来,杏花村人把他们的这种优势称为“天、地、禾”。天,就是气候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地,就是这里的神井和神泉水;所谓禾,就是指汾河水土孕育出的高粱、豌豆、大麦。

除此之外,杏花村汾酒还与西北的匈奴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汾阳古称兹氏,汉魏之前,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隔黄河而居。长期以来,两岸纷争不断,刀光剑影,争战激烈。经年累月的战争使两岸民族两败俱伤,筋骨大伤。曹魏时期,由于两族人民对战争的厌倦,汉朝廷实施和靖政策,终于促成一些匈奴部落的内附和移民。

据《晋书》记载:“魏末,复改师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这一记载说明,在魏晋时期,应该有三四万匈奴人移居到山西省,其中汾阳就达一万余人。

朝廷允许匈奴人移居内地,目的是要同化他们,采取的自然是与汉民杂居的方式。这大大方便了汉匈两族群众,他们互相交朋友,交流酿酒技术。于是汾阳地方酿酒数量大增,酒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正是这种民族的交流和互动,促使山西地区生产出一系列名酒。其中汾阳杏花村的汾清酒和竹叶青酒,最为人们喜欢和赏识。成为最早载入史册、为人所称道的中国名酒。

揭开汾酒历史神秘的面纱

□ 本报记者 梁瑜



酒文化

吕梁故事